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5.020

过剩的人文性:当代语文教育话语的困境论析

王超,陈美菱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语文教育话语是用来表达对中小学语文现象和问题的,负载教育价值和呈现社会关系的一套专业语言符号和行为方式。新课改以来对“学生中心”理念的推崇,人文性话语成为我国当代语文教育领域的主导话语。但随着人文性的高度揄扬和无限增殖,语文教育话语陷入人文性过剩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话语理念上过浓的个人价值取向,话语实践上自由的文本诠释,话语环境上芜杂的多元叙述。人文性过剩困境的成因主要涉及话语理念的认知误区、话语实践的立场偏失、话语管理的制度不健全等。消解人文性过剩困境的策略在于:重塑话语理念,遵从社会价值取向的价值引领;规范话语实践,坚守合理性立场;净化话语环境,完善话语管理制度。

关键词:过剩的人文性;当代语文教育话语;话语理念;话语实践;话语环境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5-0162-08

一 核心概念的厘定

“语文教育话语”是指语文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用以表达中小学语文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负载教育价值和呈现社会关系的一套语言符号和行为方式,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①。以话语主体作为依据划分,语文教育话语可分为官方教育话语和民间教育话语。官方教育话语主要是由教育行政决策者发出的总体性教育话语,它基于国家立场思考与行动,通过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法规,借助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传达出国家对教育的规定与使命,是一种体现国家价值取向的中心话语。民间教育话语是由中小学学生、普通民众和一般知识分子发出的个体性教育话语,它基于个人立场思考与行动,常以随笔、报刊文章、网络贴文等表达个体的教育经验与生存状态,是一种体现个人价值取向的边缘话语。

“人文性”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属性和价值追求之一,作为工具性的对立概念而备受关注。但人文性的概念模糊、解读多元,实已成为言人人殊

的语言帽子。本文无意进行性质之争或概念共识,而是基于当代消费语境,认为人文性包括个人的人文性、群体和总体的人文性。但长期以来,人文性习惯仅被视为个人的人文性。当代消费语境是一种只执著于碎片化当下的文化语境,追逐以人为本思想下的个人人文性,揄扬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生命、自由、个性等。在碎片化的消费语境下,人文性话语成为我国语文教育领域的主导话语。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将人文性理解为个人的人性或人本性,偏重人之为人的本质,止于个人首位的认知。当个人至上、人文救世时,语文教育价值就存在缩减为一个人文价值的倾向,那些曾被视为绝对而普遍的规范与真理如中心、主流等遭受质疑与解构,一种独特的人文性话语景观出现:“支流”冲击“主流”,“边缘”疏离“中心”,“弱势”挤压“强势”等。

“语文教育话语的困境”是指“人文性过剩”,即个人人文性的过度夸大而导致的人文性过剩现象。具体而言,语文教育话语过于重视个人的人

收稿日期:2024-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3YJA880046)

作者简介:王超(1971—),女,湖南祁东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①王超:《新中国语文课程话语流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文性,即张扬个人的个性、生命、尊严、自由、需求、价值等私人内容,忽视、压制或消解群体总体的人文性,即国家政治、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等社会性内容。在消费语境下,个人的人文性从社会系统中脱离,语文教育不再关注自身所处的但外在于己的复杂社会,而是一切从个人的人文性出发并回到个人自身。易言之,重视作为个人意义的人,忽视和排斥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这使得人文性成为一个脱离中国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孤悬的“个人的人文性”。

二 语文教育话语的人文性过剩困境及其表征

面对全球化、多元化的挑战,教育部在2001年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即“新课改”),教材政策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政策转型意味着教育制度的改变和价值文化的调整,体现了教育民主和多元文化价值的诉求,彰显了人文性。此后,人文性话语成为语文教育领域的主导话语,语文教材建设呈现百花齐放局面,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少现实问题,导致了人文性的过剩困境。

(一) 话语理念:浓厚的个人价值取向

个人价值取向浓厚的话语理念主要体现于语文教育话语文本。语文教育话语文本即语文教材,包括语文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教辅读本和语文试卷等。社会价值取向是指语文教材中体现的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等宏大主题和内容。个人价值取向指语文教材中个人的日常性、生活化、私人性的话语。在以人为本的热潮下,语文教材逐渐弱化政治、意识形态、爱国、革命叙事,淡化忠诚、信仰、牺牲和奉献精神,表现出个人价值取向对社会价值取向的疏离、挤压与消解。

其一,政治教育淡化的人文倾向。自新课改以来,许多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者和民众高举人文大旗,呐喊“让教育的归教育,让政治的归政治”“让语文的归语文”,强调语文只姓“语”的本分。政治教育话语成为必须淡化的权力话语,语文教材也一直试图淡化政治教育色彩,一些带有政治性和革命时代烙印的篇目被换下,如《谁是最可

爱的人》《黄继光》《刘胡兰》等课文相继被删除。伴随着“回归生活”理念的推行,语文教材更专注于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感受和私人的表达,国家和民族渐成虚化的背景,如2001年人教版高中新增了《雨巷》《泪珠与珍珠》《漫话清高》《美腿与丑腿》《热爱生命》等,这些选文生活性强,基本与政治无涉。200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收入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片段与金庸的《天龙八部》片段,合成“神奇武侠”单元。通俗小说单元展现了选文的人文倾向。语文教材主流化的生活叙事淡化了政治教育,也割裂了个体命运和宏大历史,使得人文性成为碎片化的现实。

其二,意识形态淡化乃至西化的人文倾向。人们往往将意识形态与“虚假”“欺骗”等同而论,认为语文教育弊病皆源于意识形态的强控作用,意识形态理应被祛除。在强调人本主义思想的消费语境下,语文教材存在意识形态淡化乃至西化的倾向。如2009年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读本必修三,在“爱国的沉思”单元入选了朝鲜战争的罪魁麦克阿瑟的文章《责任—荣誉—国家》。2016年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下册《同步巧讲精练》教辅书中,“雷锋做好事”配图竟为“日军背老太太”。这类“毒选文”“毒插图”的出现,其本质是意识形态问题。我国之所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是因为之前的语文、历史、政治等教材出现重大问题,包括崇洋媚外、造谣杜撰、严重西化等问题,没有能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甚至背道而驰,逆向而行。教材西化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与改变的时刻了。

(二) 话语实践:自由的文本诠释

当代是一个“崇尚自我放逐”的时代,是一个倡导每个人只需说“我要……”的个体话语时代,产生了个人无需知道人生的意义,无需关注的价值与需要的人文热潮^①,语文教育话语实践出现人文性过剩现象,主要表现为课堂教学活动中文本诠释的自由随意。

一是学生诠释话语的自由化。新课改提倡学生中心,学生成为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的最高价值,曾经处于弱势的学生话语成为强势话语,出现了

^①王超:《边缘话语的狂欢: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的个体性言说》,《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所谓个性化、多元化的“创造性阅读”“自由化解读”。如一位教师在上《项链》的公开课时,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玛蒂尔德不选择用十年的艰辛劳动来偿付项链的债务时,还有其他什么方法?^①学生的回答不一而足:直接跟佛来思节夫人说,项链丢了,也没钱还;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傍大款,利用美色来偿还债务……。这种不细读作品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滥用,使得学生张扬个性,蔑视作者,消解文本,或脱离言语而大谈人文,或神化个体感悟,语文课成为泛人文课、非语文课,语文教学成为无规定性与无目标性的“野餐”。

二是教师诠释话语的随意性。当学生成为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的最高价值乃至唯一标准时,愉快教育、赏识教育、成功教育、没有权威与惩罚的教育等风行。于是,一味讨好学生成了当下语文教育的通病,课堂教学出现许多矫枉过正的现象:从“棒杀”转向“捧杀”,从“自主”转向“自由”,从“活动”转向“乱动”等。“学生中心”演变为“学生专制”,学生教育话语成为强势话语。教师虽是官方教育话语的“代言人”,但由于学生中心的强势规约,教学活动中出现了“唯学生是瞻”的倾向,如学生说“狐狸狡猾”,教师点头;学生说“狐狸聪明”,教师鼓掌;学生说邱少云“伟大”,教师赞许学生;学生说邱少云“不值”,教师肯定。这种“怎么都行”的教师诠释话语,显然是人文性过剩的典型表现,其代价是,语文教学实践既忽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授和科学的技能训练,又弱化了教师的基本价值引导,使得教师教育话语逐渐失却,建构了生尊师卑的新型等级关系,师生关系再度紧张。

(三) 话语环境:芜杂的多元叙述

任何话语都具有特定的话语环境,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当代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多元媒体共存的语境时代,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话语影响力更大。网络媒体最鲜明的特点是信息传播及交互更为便利。在网络媒体中,每个话语主体都可以成为语文教育的话语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和评判者,抱着娱乐或谋利目的,表达着理性或非理性的民意,有的

甚至公然挑战道德底线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多元话语主体这种“众声喧哗”的芜杂环境反映了语文教育话语的人文性过剩。

一是普通民众教育话语的娱乐性狂欢。普通民众是由文化、素养、利益等不尽相同甚至互有抵触的个人或团体所构成的想象共同体,这一想象共同体精华与糟粕杂陈。他们主要以小我、个人利益为起点,以网络媒体为舆论据点,以世俗的态度解读与评判崇高神圣的人与事物。近年来,刘胡兰、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等曾激励几代人的英雄人物,成为部分媒体与民众恶搞的对象。如2015年4月,加多宝凉茶的官方微博与大V作业本互动大谈“烧烤”,涉嫌用嘲讽革命先烈“搞营销”的炒作。即便在201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之后,恶搞之风依然不绝。这类充满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既亵渎了为国为民献身的英烈,也会严重误导青少年。普通民众教育话语看似处在社会价值的边缘位置,但通常比较活跃,热衷于对主流价值阵地进行挑衅和骚扰,摒弃语文教育的社会教益性作用,表现出躲避崇高、追求卑微、娱乐至上的特征。它显露出作为社会消费与娱乐主体的意义,丧失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消解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对中心话语起着潜在的反抗与消解作用。

二是一般知识分子教育话语的拔根式批判。作为公共知识的承载者,一般知识分子视发挥个性为至高道德,崇尚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他们以反思现代性为名,把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等视为压迫与控制,认为中心话语是对个体私人空间的挤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以“我的国度不在这里”的流亡者心态,用西方现代价值理论体系,采取拔根式策略,认为中国语文教育“流失了文学与人文”“是吞噬学生灵性的大沙漠”“中学语文坑死人”“以学生为敌”“误尽苍生”等。这些学者漠视语文教育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对以往语文教育缺乏“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一笔抹杀七十年乃至百年语文教育之功。这些完全负面的批判,以釜底抽薪的批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心^②。拔根式批判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缺乏负责任的政治态度和教育实践立场,使

^①高素飞:《语文人文学性再思考》,《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4期。

^②何菊玲:《知识观:教师教育范式转变的决定因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得人文性成为一种难有确切所指的“飘浮的能指”,犹如剥一个洋葱头,当一层一层将能指剥去时,它的中心只是一个虚无。

三 语文教育话语的人文性过剩困境之归因

人文性话语已成为语文教育领域主导话语,被视为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最佳乃至唯一的救赎之路。人文性话语因而充满了不证自明的优越感,它以真理姿态君临语文教育领域,又以霸权姿态贬抑其他话语来确立自身的话语权威,从而导致了自身的过剩。其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话语理念的认知误区

对政治和权力的偏见。人们习惯对政治和权力存有偏见,将政治等同于阴谋,将权力等同于霸权,官方教育话语被视为压迫,教师作为国家和社会价值的代言人,其教育话语也被当成必须清除的霸权话语。这类偏见无益于语文教育政治环境的改善,亟需正确理解政治和权力的内涵。政治主要指围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机器、阶级革命等形成的宏大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①。它承载了一系列价值判断,如政治是道德伦理,政治即正义,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日常生活方式等。政治的内涵其实宽泛而中性。权力指一个人/物对他人/他物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权力有广狭义之分,狭义权力指政治意义上的暴力控制,常与国家机器、军队、法律等关联。广义权力指国家、团体或个人所具有的能力、力量和实力等,它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拓展到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渗透于社会生活乃至知识、话语等层面。广义权力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力量,而且是生产性的力量:它实施统治、控制和支配的方式而产生压抑、压迫和等级关系,它产生知识、话语而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乃至权力自身。权力不等于霸权和压迫。可见,语文教育不可能规避政治和权力的影响,捍卫理性的政治和权力是其重要职责。

对意识形态的误解。人们往往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欺骗,认为“意识形态之垢”是应被祛除与被终结的对象。实际上,意识形态是近代西

方的重要哲学概念,因为一系列著名历史人物的运用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概念史”,如特拉西“观念的科学/学说”、马克思“虚假的意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等。意识形态虽被比喻为随语境而改变概念的“变色龙”,但其含义大致分为三种:中性的、贬义的和褒义的。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为中性含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②而理论研究者习惯从否定意义来理解意识形态,或简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只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维度;或窄化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冠以隐蔽性、欺骗性。意识形态的含义其实也相当宽泛和中性,它是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有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分;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语文教材西化问题,实则源于混淆和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疏漏了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

(二) 话语实践的立场偏失

本土立场的偏失。本土立场是一种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立场。语文教育理应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立场,但由于我国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西方的现代性一直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参照坐标。语文教育现代化是在异域理论的驱动下艰难行进的,西方的历时性话语系统正以共时性的特征广泛传播,新课改充斥着实用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式教育理论,出现了“错把他乡当故乡”的误置现象,我国语文教育理论出现失语症。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缺少本土立场,习惯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言说。他们忽视和否定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理念与方法(如诵读、体悟、讲解、训练等),推崇学生中心、对话、合作探究等西式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认为西方理念和方法是中性的,是可以脱离具体文化背景的普遍理念和方法。实际上,任何教育理念与方法都是高度文化依赖的。

^①李艳丰:《文化·政治·权力:西方文化政治理论关键词辨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46页。

所谓的国际话语、全球话语、国际人仅存在于理念中,现实中难以存在,因为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这类先验的“背景书籍”深刻并终生影响着每个人的话语和价值观。

学科立场的偏失。语文学科立场体现的是语文学科所独具的育人内容和育人功能。“泛人文”“非语文”的文本诠释现象,其根源在语文学科立场的偏失。学习语文学科知识和学科方法,发展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语文学科的立场,也是语文教育应坚守的学科立场。更重要的是,语文教材不是纯粹客观、价值中立的真理系统,而是一种历史性、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系统。语文教材诠释是在一定的话语体系内开展的,作为受主流价值观念影响编排而成的知识载体,语文教材话语隐含着所处时代、社会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①。在当前的语文教材诠释过程中,学科立场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使庸俗化和娱乐化的教材诠释有机可趁。语文教育的学科立场偏失导致了对语文教育本体的错误认识,也使得语文教材诠释成为无规定性与无目标性的活动。

教育立场的偏失。教育立场是学生中心论的反映,是育人立场。学科立场是育人立场的知识基础,育人立场是学科立场的价值旨归。在教育立场下,语文教学更加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语文教师既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 and 创新能力,也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教育、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当“学生中心”异化为“学生专制”时,教师的合理权威与必要价值引领就已被压制、消解。可以说,学生中心论以学生的个人价值遮蔽和拒斥了社会价值,它旨在给学生以个人成就感,却并非在教育他们。因为学生中心论把知识局限于学生狭窄的生活经验之内,廉价的肯定和赞美被打包批发给学生,语文教育被调制成毫无营养的可口点心。学生中心论助长了反知性主义,语文教育用取悦儿童替代了培育学生的智力发展,语文学学习便失去了其自身的内在价值,真正的语文教育也就被摧毁了。

(三) 话语管理的制度不健全

多元媒体下的多元话语芜杂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语文教育话语主体的个人行为,它更深刻

反映了多元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话语管理制度的不健全。

互联网法律制度不健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惩治侵权行径和防御未知危险,我国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其现实针对性明显不足。如用户、公民这类宽泛的概念,很难划清普通网民、社会精英、政府组织等不同话语主体的权责界限和惩处标准,影响了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此外,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部关于网络话语权的专门法律,在执行性难题,因为在处理网络话语失范时,面临“法无明文”难执行的尴尬境遇。特别是语文教育方面的网络法律制度更是针对性缺失,这也就是戏谑、恶搞英雄的话语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互联网对话机制不健全。网络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众声喧哗”的网络话语乱象,实则是官方与民间两个话语主体之间、同一话语主体内部争夺网络话语权的问题,也表明话语主体间缺乏合适的对话机制。民间话语主体几乎占据了当下网络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他们恣意自己的话语行为、模糊或挑战主流价值的正义边界,以此来吸睛或吸金。相比于民间话语主体对互联网的过度关注与话语炒作,官方话语主体则对互联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忽视与滞后,传统媒体仍是其话语主渠道,其引导网络舆论的话语能力相应被削弱。娱乐至上的普通民众教育话语、拔根式的知识分子教育话语,既体现出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也体现出社会主流话语的引领力不足,难以克服网络平台“独白式的操纵”或“情感宣泄与无政府的杂音”。

四 语文教育话语的人文性过剩困境之消解

语文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人”包含了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总体的人三种基本形态,人文性中的“人”也从来不是一个孤悬的个人,而是与他人、国家、社会、历史等关联的产物。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应强调作为个人的人文性,也应强调作为群体总体的人的人文性。而过剩的人文性却

^①林小鸽:《论教科书的诠释:三重逻辑、现实困境与纾解之道》,《课程·教材·教法》2022年第7期。

扩张了个体意义上的人文性,排斥和压制了群体总体意义上的人文性,这既阻碍了母语教育的发展,也有悖于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旨归。为此,应寻求人文性过剩困境的消解策略,促进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 重塑话语理念,遵循社会价值引领

话语理念的形成,既有个体价值的介入,也有社会价值的介入。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对前者有能动的反作用和引领作用,即社会价值可为个体“在场”提供参照坐标和价值认同的可能性,体现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但以消费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价值危机,社会追求个性化的狂热和学校对人文精神的张扬,使得语文教育话语合法性危机频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性是我国未竟的设计方案与价值诉求。语文教育应从过剩了的人文性中走出来,强调社会价值取向对个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

话语理念要坚持政治性对人文性的价值引领。对维护国家政权而言,语文教育的政治性是绝对重要的,“‘教育’绝不可能游离于、超脱于‘政治’所设定的种种框架之外”^①，“教育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安全;在这个船以外只有洪水”^②。可见,政治制约甚至决定教育,抹煞语文教育的政治意涵乃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虚构想象。同时,语文教育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人文性也是其基本特点。如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孙犁的小说《荷花淀》中,有一段夫妻对话,当水生告诉水生嫂明天就要到大部队报到,参加抗日的的一个地区队时,水生嫂低着头对水生说了一句:“你总是很积极的。”简简单单的七个字,体现出一位年轻妻子对丈夫复杂而特有的感情,既流露出对丈夫带头报名参军的欢喜与支持,又对丈夫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事先商量一声的埋怨与嗔怪,还蕴含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男性爱国爱家、集体为先的情怀。这一语句体现了政治性与人文性的相互依存,人文话语最终指向并从属于政治目的。

话语理念要坚持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维护和巩固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精神力量,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是语文教育始终坚守的立场。作为一种法定文化和官方知识的教育,语文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语文教育话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这既是学生社会化的必然过程,也是任何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都会对下一代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必然要求,可以提升文化自信,防止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

(二) 规范话语实践,坚守合理性立场

话语实践要坚守中国立场。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应坚守母语教育的本土立场,增强话语自信。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语文教育更应强调自身的本土化,展开本土诉求。具体举措主要有:第一,建构身份认同,树立自信意识。学者和民众首先要进行身份认同,坚定“我是中国人”立场,才能对本土本民族教育保持自信,自觉重建自己自信的语文教育主体声音,具有语文教育主体话语自信意识。第二,确立本土意识,树立以我为主原则。本土意识的实质在于保持、维护、发扬本民族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以我为主包含多层意义:以本国信守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为主;以本民族利益和语文教育特色、价值追求为主;立足我国语文传统教育思想,以当前语文教育发展状况为主。第三,发掘传承优秀的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吸纳现当代语文教育经验。总之,学者和民众应立足于“中国”二字,基于“中国人”身份,基于“中国利益”“中国视域”,聚焦“中国问题”。真正有意义的批判与反思,应为中国的语文教育话语提供合理的修改思路 and 观点,优化中国语文教育话语。

话语实践要坚守学科立场。语文学科的本体是语言运用,语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并形成素养。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必须基于语言学习,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也就是获得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过程。语文教育如果偏离了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一立

^①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②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足点,就会失去自身的特色与地位。同时,主张文本的多元化、个性化解读,必须尊重文本的内在规定性。当然,文本诠释在坚守语文学科立足点的同时,也应探询语言文字背后的个人生命、主体意义和集体价值、民族国家精神等人文意蕴,有意识地将学生成长需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使知识和价值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深入人心,在语言文字的学习运用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涵养学生品格,培育时代新人。

话语实践要坚守教师教育话语合理权威。语文教育立场是育人立场,既应包括学生“人”的立场,也应包括教师“育”的立场。我们应理性看待学生中心论,重树和坚守教师教育话语的合理权威与必要价值引领。加达默尔认为,权威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①。教师代表社会、国家对学生的要求,其教育话语具有天然权威。而且,现实语文教育大都是成年人引领未成年人,知之多者引领知之少者;教师尊重学生兴趣和需要,倡导平等对话,并不必然意味着教师应该停止权威讲话;民主教学也并非让教师放弃对学生行为进行判断价值的必要责任,从而使得学生一片迷惑。语文教育是引导人向善的交谈过程,真正的对话反对独裁和放纵,承认权威。教师的合理权威与必要价值引领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三) 净化话语环境,完善话语管理制度

传统媒体之外派生出的互联网虚拟空间,已成现实社会不可或缺的话语互动场域。然而,虚拟的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也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净化网络空间话语乱象,让每个话语主体的话语在道德和法治轨道上运行,是语文教育的现实之需。

完善网络法律法规,提升管控语文教育网络话语的实效性。近年来,我国相关立法进程加快,法治触角涵盖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近来出台的《国家信息网络专项立法规划2014—2020》以刚性规则来彰显惩治与威慑,也注重发挥法治的引领和导向功能。这些网络法律法规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也对净化语文教育话语环境、保障语文教育各类话语主体的合法权益

意义重大。同时,增强网络平台管理者的监管力度和责任担当,对不合法、不合规、负能量的网络话语做出迅速反应,最大限度地杜绝话语失序乱象发生。

完善沟通反馈机制,发挥社会主流话语的引领力。多元媒体尤其互联网这个公共话语空间,可推进语文教育政策的民主化进程。语文教育本身是一项关涉社会大众的公共事业,已非语文教育行政决策者、语文教材编写者和使用者的专属领地,家长以及关心语文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参加到语文教育决策的队伍中来。因此,除了现有的沟通反馈渠道之外,还可以构建网络沟通反馈机制,让官方和民间两个话语主体、同一话语主体内部展开积极对话,及时收集和回应网络语文教育民意、察觉语文教育政策与语文教材等问题。这既能充分发挥民间话语主体在语文教育问题表征中的积极效用,也能让官方话语主体及时快速地回应错误思潮和投放权威的正向信息,积极引导多元民间话语主体合法、理性地表达情感及诉求,提升参与者话语表达的法治认知及道德素养。如通过对话让民众明白,对历史与英雄人物的虔敬,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更是一个国家赖以存续的基本价值。此外,官方和民间话语主体还可以构建语文教育话语共同体,形成教育话语合力,增强国家主流话语的价值引领力,也还话语平台一片晴朗。

结语

语文教育话语的人文性过剩并非简单的性质表达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紧密关联的价值问题。当前,语文教育的现代性仍是我国未完成的设计方案与价值诉求,切不可把个人的人文性当作语文教育话语唯一的属性和价值追求,并无限扩展其领地。人文性原本具有对知识、技术、效率等的批判反思精神,但当它一味高扬个体的人性、个性、生命、自由等个人价值,质疑、剥离或消解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社会价值,并试图解构与之紧密关联的主流价值观与体制时,语文教育话语就陷入个人的人文性过剩困境。在碎片化的消费语境下,只有重塑话语理念,遵从社会价值取向的价值引领;规范话语实践,坚守合理性立

^①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场;净化话语环境,完善话语管理制度,才能消解
语文教育话语的人文性过剩困境,让群体总体
的人文性即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与总体性实践成为人

文性坚实的思想地基和精神支柱,促进语文教育
话语的整体、健康发展。

The Surplus of Humanity: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al Discourse

WANG Chao & CHEN Mei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al discourse is a set of professional language signs and behaviors used to express the educational value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ince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dvocating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humanistic discourse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China. However, with the high praise and infinite proliferation of humanity,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education has fallen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ity surplus,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o much personal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discourse idea, free text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scourse practice, and diversified narration in discourse environment. The causes of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istic excess mainly involve the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 of discourse idea, the position deviation of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 imperfect system of discourse management. Th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humanistic excess lie in reshaping discourse idea, following the value guidance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tandardizing discourse practice, holding the rational position, purifying discourse environment, and perfecting dis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the surplus of humanity;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al discourse; discourse concept; discourse practice; discourse environment

(责任校对 曾小明)